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高校主题出版
GAOXIAO ZHUTI CHUBAN

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丛书

The Series on Minority Literature: Perspectives from A Pluralistic and United Chinese Nation

丛书主编: 姚新勇 副主编: 邱 婧



Multifarious Horcin
Speaking-Singing
Literature of
Mongolia Minority

何红艳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科尔沁蒙古族 说唱文学研究

海外借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高校主题出版
GAOXIAO ZHUTI CHUBAN

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丛书
The Series on Minority Literature: Perspectives from A Pluralistic and United Chinese Nation

丛书主编: 姚新勇 副主编: 邱 婧

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研究

Multifarious Horcin Speaking-Singing Literature of Mongolia Minority

何红艳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研究 / 何红艳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7. 12

(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668 - 2231 - 4

I. ①科… II. ①何… III. ①蒙古族—说唱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 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9739 号

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研究

KEERQIN MENGGUZU SHUOCHANG WENXUE YANJIU

著 者: 何红艳

.....

出 版 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武艳飞

责任编辑: 武艳飞

责任校对: 邓丽藤

责任印制: 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排 版: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 4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总 序

本套丛书中刘大先先生的著作题名为“千灯互照”，本是形容中华多民族文学丰富多彩、交相辉映之态，现借以形容这套总数不过十本的丛书，自然太过夸张，但若以点出本套丛书之于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多样性、丰富性，虽仍夸张，却并非漫无边际。至少我们的确可以罗列出本丛书相关的三五特点。第一，以主题、研究专题、研究领域为集结的文学研究丛书自然很多，但征诸不同地方的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者，将其成果集结起来，组成一套研究品质较为纯粹的丛书，且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这样的情况恐怕还不多见。第二，本丛书的作者为中青年学者，有的已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多年，成果丰硕；有的虽然才博士毕业几年，但已经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其中更有几位已跻身于少数民族文学相关研究领域的前列。本丛书收录的十本著作中，或是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或是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这都保证了丛书的新锐性、前沿性、专业性与可靠性。第三，丛书的主题、领域、视角多样丰富，所涉族裔文学现象多样，时代纬度参差交错。有神话与史诗研究，民间口头文学及说唱文学研究，族裔文学个案剖析与多民族文学现象的互动分析，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及少数民族文艺创作、表演现象的宏观扫描及理论概括，某一族裔文学、文化经典传统个案的诗学理论之内在结构、文本肌质、表演仪式、叙述模式的深度剖析与细致型构，某一族裔当代文学创作的文化转型、民族心理与时代张力的考察，族裔母语文学的考察或母语、汉语双语互动的分析，等等。第四，丛书名为“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这并非政治正确的口号，而是本套丛书研究特点的自然呈现，更是丛书作者之于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态势的敏锐观察与理论回应。而具体落实于本丛书上，则呈现为一个重要的共性——互文性。第五，互文性。中国多民族文学、文化的互文性，某一具体族裔文学、文化现象中的互文性，

也为本丛书多数著作的特点之一。这既是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更是中国多民族历史、文化、文学互动的自然结晶。比如神话研究，自新时期以来重新恢复生机，国外各种神话学理论渐次被介绍到中国，积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神话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神话所表征的民族或族群关系之“分”的趋势却日益明显，研究者、研究对象、接受群体的民族身份的“同一性”也似乎愈益强化。而《中国多民族同源神话研究》的作者王宪昭先生，在多年材料与研究积累的深厚基础上，有力地考辨了我国多民族神话“同源母题的作品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这一现象，不仅进行了数量可观的神话文本的互文性解读，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增添了丰富多彩而又切实有力的论证。再如《锡伯族当代母语诗歌研究》一书，从书名上看，此书似乎只涉某一具体族裔的母语诗歌创作，但实际上，锡伯族的形成，它从祖国的大东北迁徙到大西北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宏伟史诗。因此在锡伯族的诗歌中，故土的大兴安岭、白山黑水，新家园的乌孙山脉、伊犁河畔，交相辉映；“大西迁”的刻骨铭心与“喀什噶尔”的深情咏叹，互为参照；族裔情感与国家情怀，水乳交融。满、汉、蒙、哈、维等语言因素都不同程度地结构或渗透于锡伯语中，因此，本书相当关注锡伯族母语诗歌创作与汉语之间的关系，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东巴叙事传统研究》一书，以更为纯正的理论品质，更为肌理性的文化、文本研读，从多角度、多层面探究了东巴叙事传统的成因、传承、流布、特征，并通过深描东巴叙事文本在祭祀仪式中的演述，揭示了口头文本、书面文本、仪式文本、表演文本在民众的生活与精神空间中的互文互构关系。作者还把东巴叙事传统与彝族、壮族、国外的史诗作了横向的比较研究，对当下的民间叙事学、史诗概念及类型作了深入的反思，表现出与国内、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对话的努力。

说到研究之间的互文性，对有心的读者来说，其实从本丛书的不同著作中也不难发现。比如说，丛书中有的研究主题相对比较封闭、形式化，所说、所论也容易被归为某一民族的特点，这尤其表现在那些神话或史诗研究中。而另一些有关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研究，则相对更注意“民族”“民族文化”“民族文学”“民族意识”“民族认同”的相对性、建构性。对其进行有意识的对照性阅读，或可互为弥补、相互启发。

比如《彝族史诗的诗学研究——以〈梅葛〉〈查姆〉为中心》和《凉山内外：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论》，所论文学现象皆属彝族，而前者着重于通过

细读《梅葛》《查姆》揭示彝族史诗的诗学特征，后者则更敏感于新中国民族识别、少数民族文学工程的实施，之于整体性的彝族诗歌、彝族意识的生成、流变与转型的促动。这样，后者之于前者可能就对“彝族”“彝族文学”的天然性、自在性多了质疑性价值，而前者则又可能提醒后者，彝族、彝族意识、彝族认同的建构，并非权力、他者的随心所欲。这样的互文性阅读，有可能突破本丛书有限的数量，更为宽广、丰富、深入地去理解、把握中国文学、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之复杂性。

当然，不管本丛书的认识价值与问题视野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其视域肯定是有限的，况且收录其中的著作质量并非齐一，也自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个中缺憾不知有无机会弥补。

感谢王佑夫、关纪新两位先生对本丛书的大力推荐，感谢丛书作者惠供大作，也感谢暨南大学出版社徐义雄社长的鼎力支持。

姚新勇

2017年7月

于广州暨南园

序

我一向不喜欢给别人（包括自己的学生）写序，当然学生一再请求，顾及师生之谊，有时也会写，但不会按学生所希望的那样写上一些表扬的话。学生称恩师，导师呼贤契，我觉得这有些庸俗。好的书稿，自然会以其质量取信于学术界。

何红艳为她这部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展而成的书稿



王鍾陵教授

请我写序时，我对她说，我不喜欢写序，但愿意为你这部书写一篇序。之所以愿意为此书写序，是因为我想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说一说。

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学史应该是一部以汉族文学为主体，融合多民族文学的文学史。但是，国内学界不仅对汉族文学的研究鲜少有内在逻辑通贯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也存在大片的空白。完成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是文学史革新的重要目标之一，它的完成还有待时日。

为了培养研究少数民族的人才，我于2000年开始，便每年在招收汉族古代文学博士生的同时，也招收少数民族文学博士生。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我特别关心三个区域：新疆、西藏与内蒙古。当年招收何红艳，有两个原因：一是觉得她是蒙古人，蒙古语是她的母语；二是她学的专业是古代文学，汉语的说、写都很流利，也有一定英语基础。于是在已经决定为新疆师范大学培养一名博士生的同时，又额外多要了一个名额，也就是说，那一年，我招收了两个少数民族文学方向的博士生。前后相承的几个从新疆招来的博士生，

从事于我所提出的“丝绸之路文学”的研究，而何红艳则从事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的研究。

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必须注意两个要点：一是注意它的原生状态，二是注意它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汇状态。我以为，这两点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特点与价值之所在。

早在1986年，我即提出过革新文学史研究的四项原则，其中有一项便是整体性原则，这一原则致力于对历史材料做整体把握，要求一种对文学和其他种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伴生关系、因果关系、相互激荡融合等种种关系的认识。我在《文学史新方法论》中说过：“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要求还原回去，从文学与众多其他因素的伴生关系中，从其特定的块团形式中把握那一种浑沦的勃动。”^①少数民族文学活动的研究，更是必须贯彻整体性原则与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我们从何红艳的书中可以看出，科尔沁蒙古族的民歌是如何与当地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特别重要的是，少数民族文学活动具有原始性与未分化性的特征，因而它构成了文学发展的胚胎，有着日后诸种文艺形式分化的胚芽。何红艳的研究表明，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已经是戏剧与小说的综合。准确地说，它已经内含了发展为戏剧与小说的胚芽。说唱文学在汉族文化的初始形成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例如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的《诗经》，我们知道它可唱，可伴奏也可舞蹈。但从总体上说，它的叙事性不强，估计在当时它并非说唱文学。汉族文学史已经表明，《诗经》的后续发展是抒情诗与赋。虽然汉族日后产生了众多地域性、宗教性的说唱文学，它们对汉族小说和戏剧的产生仍然有其重要的作用；但这些说唱文学，都已经是在汉族书面文学高度发展以后产生的。所以，我们如要研究原始的说唱文学，就必须到少数民族中去。这正如现代残留的原始部落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点一样。何红艳正是按照我所强调的把田野调查作为研究之基础的要求，深入她过去生活的地区，做了广泛的调查，写成了这本书。这些仍然带有一定原始性的说唱文学的材料无疑是可贵的，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文学发展的种种胚芽如何从其母体的胚胎中渐次生长的情状。

我颇怀疑，史诗便是一种大型的说唱文学，是古歌与传说的连缀与改造。随着它的表演成分愈益加重，原始的戏剧日渐成形，希腊戏剧发展得早，应该与此有相当的关系。当然，说唱文学也能成为长篇叙事文学产生的温床。

无论新疆还是内蒙古，都并非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新疆地区由于丝绸

^① 王鍾陵：《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85页。

之路的存在，多种文化汇流的现象特别突出。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与汉族、满族的交往也十分密切，因此这两个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学活动，不可能按其原生路径缓慢发展，而必然是在文化渗透、融合乃至文化跃迁中发展。这也是世界各地文学乃至文明发展的一条规律。我们在何红艳的书中，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2013年6月，我在南昌大学开会时遇到杨增树大校，他当年参加过20世纪90年代初在辽宁师范大学召开的文学史理论研讨会。我在会上将我于1990年在拙著《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中提出的“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再次讲了出来，引起了一场大辩论。以《文学遗产》原主编徐公持为首的相当多的人不同意我的意见。徐公持作为中国的第一个文学博士，还对我说：“王鍾陵，你写了《中国中古诗歌史》，我们认为你建立了一座完美的宫殿，你现在又提出新概念，倒让我们认为你还存在不足了。”我回答说：“我宁可打碎你们认为我建立了一座完美宫殿的印象，也要提出新概念。”杨增树大校在从三青山返回南昌的途中对我说：“实践证明你是对的，20年来，‘原生态’概念大行其道。”

何红艳此书正是贯彻“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努力去靠近文学活动原始的发生与生长状态，从而取得独特的价值。虽然20世纪50年代，国家曾组织过采集少数民族民歌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与何红艳所从事的工作不同，那只是一个以记录作品为目的的工作，而何红艳则是依据“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立体地研究整体形态的文学艺术活动。因此，我以为，这样的书目前还是太少了。

当然，我并非认为何红艳此书十分成熟。正如她自己所清醒地认识到的那样，该书还存在需要改进之处，尤其对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在表演、民俗和审美三个层面上的解读，需要深入和加强，还需要对各地表演的差异性进行比较说明。另外，对艺人的研究也有待深入挖掘。

值得提到的是，何红艳在其写作博士论文时就已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她有如下回忆：“为研究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我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先后采访了62位民间艺人，为论文的书写准备了第一手资料，翻译整理了相关艺人的资料和相关笔记有30多万字。这些采访调研为我今后的研究拓展了空间。文学进程从来都是和民族心理、民族思维和民族发展过程相一致的。受此启发，我把研究的方向调整为贯彻导师提出的‘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并接受美国人类学家怀特的文化分层观点和方法。在论文第二稿对整个文章布局做了大调整。我利用一周时间写了四万多字，在2004年4月25日交上，三天后收到王先生的反馈信息：修改意见7条。我立刻按照修改意见认真查阅并修

改，5月15日上交第三稿，5月20日收到反馈意见：此稿可以，通过。但先生还是给我写下了5条修改意见。在从论文初稿到三稿的修订过程中，我真切感受到了先生治学的严谨以及对研究问题整体把握的深刻性、新颖性与独创性。这些我将受益终身，也是我未来治学的目标。也正是在先生的指导下，我一直延续我的博士论文研究。”除了就论文的修改提意见外，我也对每个学生进行了次数不等的指导谈话。在我的电脑中，还留存着一段名为“与何红艳谈叙事诗研究”的录音文件。这些准备作为她进一步拓展民歌研究领域打开了一扇窗，为此她也一直走在科尔沁民族文化艺术研究的道路上。今天看到她沉淀的新作摆在面前，在为她的坚持而感动的同时，也预祝她在今后的科尔沁文化艺术研究上取得更大成绩。

如今，何红艳已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她的科研成绩在同年龄段的高校教师中是比较突出的。我也希望她以已经贯彻于她的书稿中的新的思路继续从事科尔沁蒙古族文学、文化活动的研究，并逐步拓展到对整个蒙古族文学、文化艺术活动的研究中，这样，她的研究才能够取得独特的价值。在她的专著《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研究》出版之际，我谨以这篇序作为对她的勉励，并送上我对以“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及新逻辑学思维方式写成的新中国文学史终将问世的深深的祝福！

王鍾陵

2017年1月20日于苏州

总 序 / 1

序 / 1

绪 论 / 1

第一章 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的地缘因素 / 13

第一节 蒙古民族形成的源流 / 14

第二节 科尔沁蒙古族的生态环境 / 17

第三节 科尔沁蒙古族的说唱文学与文化认同 / 24

第二章 科尔沁蒙古族经济形态与说唱文学 / 35

第一节 神话与狩猎经济时代 / 35

第二节 英雄史诗与游牧经济时代 / 38

第三节 现代说唱方式与农牧经济时代 / 40

第三章 多元文化对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的影响 / 44

第一节 佛教文化对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的影响 / 44

第二节 萨满文化对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的影响 / 50

第三节 汉族文化对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的影响 / 59

第四章 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的表演层面——说唱方式 / 65

第一节 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的语言特征 / 65

第二节 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的音乐特征 / 80

第三节 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的演唱特征 / 90

第四节 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的独特性 / 105

第五章 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的民俗层面——生存方式 / 107

第一节 民俗与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 / 108

第二节 艺人与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 / 119

第三节 观众与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 / 123

第六章 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的心理层面——价值取向 / 125

第一节 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的多维价值取向 / 125

第二节 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与民族精神 / 129

第三节 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的教育传承价值 / 136

第四节 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的审美价值 / 143

附 录 / 152

附录一 “纪念曲艺大师琶杰 100 周年诞辰大会”纪实 / 152

附录二 科尔沁蒙古族情歌的收集整理概述 / 166

附录三 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歌调研 / 170

附录四 科尔沁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异文
整理 / 179

附录五 各地民歌收集整理调查报告 / 187

参考文献 / 195

后 记 / 202

绪 论

说唱，又叫曲艺，是用来讲唱历史、传说、故事及文学作品的艺术体裁，可用乐器伴奏，也可无伴奏，是音乐、文学和表演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以叙述功能为主，兼有抒情功能，具有说唱音乐与语言音调密切结合的特征。科尔沁蒙古族的说唱艺术种类主要有陶力（古代英雄史诗）、好来宝和乌力格尔（蒙古说书）等，它们的历史源远流长，至今仍流传在蒙古族聚居区和蒙汉杂居地区，深受广大蒙古、汉族群众的喜爱。

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主要流传在科尔沁草原上，是亦说亦唱、说唱结合的艺术形式。例如，歌谣、民歌、英雄史诗、祝词、赞词、民间故事、史话、叙事诗、好来宝和乌力格尔等。从狭义的角度来看，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主要是指朝仁乌力格尔、胡仁乌力格尔和叙事民歌，现在主要指的就是胡仁乌力格尔和叙事民歌。从根本意义上讲，文学是文化的派生物。任何地域、任何民族的文学，都与本地域、本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特有的文化形态，以及群体性的人文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关系。

“科尔沁”既是一个部落名称，也是一个军事名称，之后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衍化为一个地域名称，并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在这个区域中，民族语言、艺术形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生活方式等都具有多元一体化的特性，是蒙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尔沁”一词原系鲜卑语，最早见于《南齐书·魏虏》。书中在记述北魏拓跋鲜卑时写道：“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① 鲜卑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清末著名蒙古史学者沈曾植认为“蒙古语与鲜卑语

^①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84页。

相去无几”^①。带仗人“胡洛真”为北魏军事组织中的宫廷侍卫军，12世纪蒙古社会也存在着同样的军事组织。据《蒙古秘史》记载，1189年，成吉思汗与乃蛮部的塔阳汗在进行决战的前夕组建怯薛军，令带弓箭人“豁儿臣”与散班、护卫等侍卫军轮流入班执勤。鲜卑带仗人“胡洛真”与蒙古带弓箭人“豁儿臣”均为现代蒙古语“Horcin”之词源，汉语写成“科尔沁”，意为弓箭手。新中国成立后，把通辽命名为会盟（哲里木盟）所在地。1999年，撤盟改为通辽市。“科尔沁”一词是包含历史、部族和地域三重含义的名称。科尔沁蒙古族的文化经历了传承、积淀、演变和整合的过程之后，形成了复合、多元、开放的区域文化体系，这些为科尔沁的历史文化发展提供了丰腴的土壤和广阔的背景。

科尔沁草原是蒙汉杂居的地方。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相互交融是蒙古族说唱文化赖以成长成熟的温床。一种艺术门类的产生，一种艺术形式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民族和文化的根基以及一定历史阶段的主客观条件。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在发展和流变中，在与存在于同一时空的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渗透中，形成并保持了它的传统性。在接受中原文化、佛教文化等外来文化的影响时，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并没有失去“自我”。

蒙古族说唱文学兼有小说和戏剧的综合特色，是有声有色、能听能看的小说，同时也是有情节、可读可看的戏剧。它吸取了两种文学艺术形式的营养，吸收了小说渐进式的叙述技巧，加强了戏剧表演中的戏剧冲突效果。它没有小说的拖沓而具有戏剧的紧凑凝练，没有戏剧的跳跃而具有小说的细腻委婉。它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是一种亦说亦唱的文学艺术形式。小说和戏剧已经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被中外学者研究探讨，也有了相当完备的理论作为创作指导和批评依据，而作为具备两者之长的蒙古族说唱文学，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没有被更多的学者所注意，至今还淹没在“民间文艺”“地方小曲”的行列中，实属可惜。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可供研究的“文本”。完整详细的蒙古族说唱文学的底本相当难找。其一，因为它是口头文学，是一次性的表演艺术，随说随散，同时艺人因生活所需，一般说唱底本是秘而不传的；其二，口头文学的随意性强，艺人和听众是直接接触，为了演出效果的需求，有时会即兴发挥，几乎每次表演都不一样，所以艺人只有内容提要，没有细节，以便增删情节；其三，它是用当地方言表演的，所以蒙古族说唱文学的普遍性受到了限制，只要离开它的母体——科尔沁大草原，它就无法生存，这使它欠缺学术认可度，

① 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二），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第236页。

也限制了它的研究范围。

蒙古族作为一个统一民族出现于中国及世界上是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落的1206年。这之前的蒙古族民间说唱文学的发展状况基本无史可查。但成书于1240年的《蒙古秘史》已经是一部成熟的散韵结合的著作。在这部书中，韵文达1700多行。其中第195节，散文共655个字，韵文却有6段，64诗行。其音韵格律方面有一定规律性，以节为单位，押头韵或腰韵、尾韵，惯用对仗，形式复沓。时至今日，它也是颇令人赞赏的。虽然它不是说唱文学，但它可以说明，在《蒙古秘史》成书时，散韵结合已成为较通行的文体，且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它表明在这之前，蒙古先民在以散韵结合的方式叙事、说唱已有很长的历史了。

在整理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的研究资料时，笔者被其中复杂而精妙的文学技巧所吸引，同时也为这种技巧得不到学者的重视而感到惋惜。蒙古族说唱文学研究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园地，胡仁乌力格尔、好来宝两者都有一定的文学文本做基础，以灵活的说唱叙事方式手段，是我们研究的无尽宝藏。

一、文献回顾

1. 国外收集、整理、研究情况

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是蒙古族民间文学的一个分支，具有悠久的传唱历史和传播基础。国外对科尔沁蒙古族说唱文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蒙古国）的策·达木丁苏荣（Ts·Damdinsuren）于1943年出版的《民间乌力格尔奇、胡尔奇、伊如哥尔奇们》一书，全面介绍了科尔沁说书艺人们的表演风格和流派。之后蒙古国学者宾·仁钦（B·Rentcen）《论蒙古民间文学中书本故事体裁》（1959），蒙古国的德·策伦索（D·Charunsdam）《本森民间故事的特点》（1968）、《汉族文学作品在蒙古地区口头流传情况》（1969），从体裁、内容两方面介绍了说唱文学的来源、分类，为以后的研究领域打开了思路。其中，宾·仁钦在他的书中介绍了琶杰《武松打虎》的片段，这是蒙古国学界对科尔沁说唱文学研究的开始。匈牙利的蒙古学家德·卡拉（G·Kara）1970年出版的长达351页的法文专著《一个蒙古民间艺人的诗歌》（*Chants Dun Barde Mongol*）的单行本，专门研究了琶杰演唱的好来宝和史诗《格斯尔》的片段。苏联著名汉学家波·李福清（B·Riftin）写的《书本故事与口头文学的联系》，从不同的文本上对说唱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德国著名蒙古学者瓦尔特·海希西（Walther·Heissig）1979年出版了德文著作《蒙古英雄史卷》（第八

卷),他在这本书里把科尔沁蒙古族民间艺人的演唱翻译成拉丁文和德文,还发表了相关的研究论文。最早开始研究英雄史诗的蒙古族学者是松巴堪布·益西班牙觉(1704—1788)、察哈尔勃什·罗布桑楚勤图木(1740—1810)。从20世纪开始,著名学者扎姆察拉诺·策旺(1880—1939)毕生研究史诗,对此做了大量工作,他搜集的史诗和民间文学作品数量特别多,为研究工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苏联科学院院士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1884—1931)的著作为蒙古族史诗研究提供了资料。达·策仁苏德那木院士从事蒙古语说唱故事和本子故事的搜集、整理研究。德国著名蒙古研究学者、波恩大学教授瓦尔特·海希西,多次来科尔沁搜集、整理史诗和胡仁乌力格尔,发表了多种文字的作品、专著。苏联著名学者尼·波佩详细地从各方面探讨、分析蒙古史诗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蒙古国著名学者波·任多从1929年开始研究、调查科尔沁蒙古语说书及英雄史诗,并撰写了大量学术论文。蒙古国教授策·达木丁苏荣从1943年开始研究蒙古族民间文学,在他于1959年出版的《蒙古古代文学一百篇》中就有琶杰演唱的《水浒传》选段。蒙古国教授达·策仁苏德那木在1961年搜集、整理、出版了毛依罕作品《呼日乐巴特尔》,同时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章。美国密苏里大学教授约翰·波理在1997年到科尔沁做田野考察,去扎鲁特旗采访了著名说唱艺人劳斯尔。约翰·波理的一部研究说唱艺术的著作的最后一篇,就是在内蒙古扎鲁特旗完成的。

2. 国内学者的研究情况

1955年10月25日,白浩洁和钱民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了《内蒙古民间艺人——琶杰》,这可以说是第一篇介绍科尔沁民间文学的文章。不久,嘉其在《内蒙古文艺》刊物上发表了《民间演唱家——毛依罕》。1956年1月14日,李家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草原上的说唱诗人毛依罕》等文。从此,国内学者开始对琶杰、毛依罕等民间艺人的作品进行研究,前后共发表研究文章数篇。国内学者系统地收集、整理科尔沁说唱文学还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其研究成果如下:

(1) “陶力”研究。

史诗研究在蒙古族民间文学研究中是比较成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仁钦道尔吉的《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一书,由“草原勇士的故事”“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独特的情节结构”“丰富深刻的蕴涵”“生动的艺术形象”“精湛的诗歌艺术”“传统史诗的继承和发展”“天才的口头诗人江格尔奇”“流传和演唱”“搜集、出版和研究”十章组

成。^①1994年,他又发表《〈江格尔〉论》,从理论上分别就史诗的形成、文化的渊源、社会原型、发展和变异、人物形象、语言艺术等方面做了全面的分析,同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此书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科尔沁蒙古族史诗的研究,大多是根据艺人演唱整理、编辑的资料。这包括金扎木苏演唱的《宝格德格斯尔汗传》、琶杰说唱的《英雄格斯尔》,还有其他艺人演唱的《阿斯尔吉干海青》《宝迪嘎拉布汗》《莽古斯的故事》等。陈岗龙博士出版了《蒙古英雄史诗锡林嘎拉珠巴图尔——比较研究与文本汇编》。他用近10年时间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全部17种异文中的16种,并全面、忠实地将各种异文集中发表出来。在书中,他着重强调了在记录口头文学的过程中采用语言学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研究史诗,要有全面的观点,不能只是研究长篇,而忽视或忽略中小型史诗,我们只有对所有的史诗进行个案研究,弄清围绕它们的所有方面的问题,史诗研究才能真正获得整体提高。陈博士在比较《锡林嘎拉珠巴图尔》史诗的16种异文时,采用母题比较研究法,将其中的母题归纳为史诗“原始母题”“后增母题”和“借用母题”三种,用大量例证令人信服地展现了这部史诗是如何在现实基础上以蒙古英雄史诗传统范例被创作出来的。他的研究虽然是史诗个案研究,但已经延伸到了民间文学相关作品以及一些相关样式的研究。此书的研究方法、视角、论述结构等对研究民间文学是一种很好的借鉴。

(2) 好来宝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还停留在一些创作曲目的收集上。如《琶杰和毛依罕好来宝选》《蒙古族传统好来宝》和《蒙古现代好来宝》等。萨·阿拉玛斯的《好来宝研究》,可以说是一部系统全面收集、整理、研究好来宝的文献参考书。它通过六个章节来论述好来宝的源流、发展、分类及特征:①好来宝收集整理研究的概况;②好来宝的范围与概念;③好来宝的起源;④好来宝的发展;⑤好来宝的分类;⑥好来宝的特征。

(3) 胡仁乌力格尔研究。

胡仁乌力格尔也叫蒙古说书,是在明末清初形成的文体,是蒙汉文化交流的产物。1959年,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的首届国际蒙古学大会上,蒙古国学者宾·仁钦做了题为“蒙古族民间文学中的本子故事《胡仁乌力格尔》”^②的学术报告,不仅谈到了说唱本子故事的特点及其音乐曲调,而且叙

① 仁钦道尔吉:《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② Studi Amongolic a Instituti Linguae Elitterarum Comititi Scentiarum et Educationis Altae Reipublicae Populi Mongoli ЖАHP дeнгeн——uuliger B MoHTOJI6C.